

翻譯者、作者與讀者的主體對照：

走出民族誌表述危機*——兼評簡美玲〈苗人古歌的記音與翻譯：歌師 Sangt Jingb 的手稿、知識與空間〉

何菊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

民族誌的「表述危機」是人類學的一種歷史困境。如果完全把「寫」（表述）等同於純粹的「再現」，或者一味地自白式反思，會割裂人類學研究中主體、客體、主客體關係三者之間的聯結。民族誌寫作方面的一些新探索倘若能將上述三者有效地結合起來，在一部作品中完成對象研究，揭示研究過程，探索研究者的知識準備和生產，還為讀者提供充分的參與空間，便可以為走出人類學歷史困境作出一點貢獻。簡美玲的論文〈苗人古歌的記音與翻譯：歌師 Sangt Jingb 的手稿、知識與空間〉的寫作便有著這樣的自覺意識。她民族誌通過分析苗人古歌文本，解讀歌師生命史，以及闡釋在記錄、翻譯和學習古歌過程中歌師和人類學家的互動，不僅討論了歌師對古歌的創作，展示了人類學家製作民族誌的過程，也深入闡述了古歌、歌師、人類學家三者之間形成的各種複雜關係，其開放性的寫作方式還向讀者提供了參與民族誌研究的空間。因此，該論文的學術突破在於：簡美玲在一篇民族誌的寫作中通過對應式地呈現文化翻譯者、民族誌作者、民族誌讀者的角色與關係，既完成了對本地人、本地文化的分析，也反思了民族誌研究的背景與過程，還為讀者進行民族誌的閱讀留有餘地，從而在解決主體、客體、主客體關係三者之間聯結的問題上為走出民族誌表述危機進行了一種有力嘗試。可見，在一部民族誌的寫作中同時完成「對對象的研究」、「對過程的研究」

* 本文寫作動機源於「2013海峽兩岸人類學論壇：全球化、文化多樣性與地方社會」（新竹：2013/6/28-6/29）的學術交流，武漢大學朱炳祥教授、崔應令副教授等諸位學者對本文寫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議。特別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人的寶貴意見，使得本文的寫作思路更加清晰。

以及「對求知主體的整體性研究」，並使它們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嘗試對民族誌敘事方式（傳統民族誌的全能視角和實驗民族誌的焦點視角）的變革，有益於探索改變後現代人類學「破而未立」局面的有效路徑。

關鍵詞：民族誌、表述危機、主客體對照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民族誌作為人類學獨一無二的研究方法以及名正言順的研究成果，其實踐與寫作的基礎成為爭論的焦點。後現代人類學者用「書寫文化」來概括民族誌的基本屬性（Clifford and Marcus 1986），「書寫」作為一種表述行動並不等於純粹的「再現異文化」，那麼「書寫」作為一種再現文化的手段其本身就存在著危機。簡而言之，民族誌存在著「表述危機」。這也是人類學以民族誌呈現被研究文化和研究對象所遇到的困難。後現代人類學者對田野工作進行的嚴肅探討也沒能解決上述問題，仍然無法消除人類學田野工作過程與其研究結果的脫節現象。以Paul Rabinow（1975, 1977）的早期作品為例，他並沒有將田野材料、收集田野材料的過程以及對這些材料和收集過程進行的分析研究寫入同一部民族誌著作，而是另寫了一部《象徵支配：摩洛哥的文化形式和歷史變遷》先行出版。而他的探索性民族誌作品《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在兩年後以一種「小品」形式出現並成為實驗民族誌的代表。前者是基於摩洛哥田野材料對研究客體的理論分析；而後者是研究者對田野工作過程與經驗的反思。整個摩洛哥田野工作及其理論研究中的主體、客體，以及主客體關係被分割在不同體裁的作品中。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Rabinow（1996, 1999, 2003）逐漸轉向對生物技術等高新領域的研究，探討當代人的道德處境和知識的生產。Rabinow目前的研究領域主要屬於科學技術範圍，其交流對象更多的是擁有高學歷和尖端科技的精英人士。他希望通過探究當代人類生活被科學介入境況後創造出人類學新的理論和方法，本文暫不針對這些新理論和新方法進行評論。然而就其現有研究成果來說，對新興科學技術與人的關係之分析（Rabinow and Dan-Cohen 2006）、人類學家如何與科學家等其他知識精英合作的背景與過程（Rabinow and Bennett 2012）、人類學家對理論方法新體系的建構（i.e. Rabinow and Stavrianakis 2013, 2014）這三方面問題都分別被置於不同的作品中呈現。因此，Rabinow在人類學的傳統研究領域（如摩洛哥異文化）所面臨的困境依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人類學、民族誌、田野工作仍舊需要徹底的批判與反思。

簡美玲的論文〈苗人古歌的記音與翻譯：歌師Sangt Jingb的手稿、知識與

空間) (以下簡稱〈苗〉) 是一次有價值的民族誌寫作試驗。〈苗〉文選取文化翻譯為研究視角, 將苗人古歌文本和歌師生命史作為研究對象, 討論古歌文本所展示的空間文化和知識生產, 分析歌師在創作古歌文本時具有的多重身分, 認為不同版本的翻譯文字之間顯示的「縫隙」展現了譯者(歌師)的意識與現身。它通過對苗人古歌文本的分析, 對歌師生命史的解讀, 以及對在記錄、翻譯和學習古歌過程中歌師、人類學家行為的闡釋, 不僅討論了歌師對古歌的創作, 展示了人類學家製作民族誌的過程, 也深入闡述了古歌、歌師、人類學家三者之間形成的各種複雜關係, 其開放性的寫作方式還向讀者提供了參與民族誌研究的空間, 進而在解決主體、客體、主客體關係三者之間聯結的問題上, 為走出民族誌表述危機進行了一種嘗試。

就指稱「人」的主體來講, 筆者認為可從本地文化的翻譯者(本地人-歌師Sangt Jingb)、民族誌作者(人類學家-簡美玲)、民族誌讀者(本文作者-評論家)三個焦點, 於民族誌內外對〈苗〉文所蘊含的更廣泛意義層面的主體、客體、主客體關係進行梳理和闡釋。

一、歌師Sangt Jingb：本地文化的翻譯者

歌師Sangt Jingb的「翻譯者」角色是〈苗〉文通過討論歌師與古歌關係中最重要的研究發現, 而翻譯者角色是他作為承載苗人社會文化的一個主體的具體表現。在〈苗〉文中, 歌師與古歌是通常意義上民族誌的研究客體。文章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通過對這些研究客體的分析揭示歌師與古歌的關係。按照筆者對〈苗〉文觀點的理解, 歌師與古歌的關係可以被概括為: 歌師重寫了古歌, 而古歌成就了歌師。在半個多世紀的生命經歷中, 歌師從以口傳方式學習古歌發展到有意識地重新編寫古歌, 古歌的豐富內涵驅使他不斷追問其意義以實現自己的理想, 而他的再加工亦使苗人古歌獲得了新的時代生命。(簡美玲 2014:205-210, 237-243)

古歌文本和歌師生命史是〈苗〉文展開部分理論分析的兩條基本線索, 它們不僅展現了傳統古歌與現代社會並置的空間文化和知識, 還揭示了歌師

在吟唱、記錄和整理古歌過程中獲得的多重角色，而翻譯者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角色。〈苗〉文認為歌師Sangt Jingb分別扮演了儀式專家、苗人古歌的記錄者和翻譯者等角色。換句話說，歌師是踐行其職業的行動者，也是自身文化的記錄者和翻譯者。由於其極富個性的主觀創作，我們甚至可以將歌師Sangt Jingb看作新時代古歌的作者。隨著文章結構逐一展開，這些角色得以依序呈現。根據〈苗〉文對歌師生命史的回顧，我們可以瞭解到：Sangt Jingb學習古歌將自己訓練為歌師，作為在儀式中對唱古歌的行動者，他使流傳的古歌融入現代苗人日常生活（同上引：206-207, 209-240）；Sangt Jingb走訪各個苗寨收集古歌，並把聽到的口傳古歌由語音轉換成注音符號，使自己成為散落于民間的苗人古歌的忠實記錄者（同上引：206-207）；當Sangt Jingb發現注音符號不好用來記歌，於是以苗文重新編寫以前記錄的古歌手稿，最後將苗文古歌譯為規律的漢語五言詩句，在記音、編寫、整理過程中他轉變為擁有自己獨特見解的古歌翻譯者（同上引：207, 210-213）；Sangt Jingb以苗漢雙語對照形式製作古歌文本，並以現代地名指稱古歌中相應的地名，除此以外他還為特定短歌內容配上圖畫，他向人類學家指出自己整理古歌的工作與其他人的區別，表達自己重寫古歌的觀點與理想，憑藉驚人的毅力與執著他通過意義闡釋賦予古歌新的時代生命，從而成為古歌的當代作者（同上引：210, 216-234, 237-239, 241-242）。

與行動者、記錄者角色不同，歌師Sangt Jingb的翻譯者角色比較隱蔽，只有在古歌各種文本的差別中才能分辨出來。在一次次探索中，Sangt Jingb試圖採用各種方式翻譯古歌，書寫不同形式的古歌文本。苗人古歌在傳統上以口耳相傳、口頭演唱，原本並無文字留存。清代以後逐漸有一些用漢字苗讀將古歌記音保存的文本出現。歌師Sangt Jingb最初用漢字苗讀、注音符號、拉丁字母等為古歌記音，後來學習用苗文重寫古歌。他認為以苗文記錄古歌有利於在儀式上對歌，也有利於將短歌片段集結成內容完整、形式宏大的古歌，並且其他苗歌專家整理的古歌文本故事性不足，也不知道歌詞為何如此表述。（同上引：206-207, 209）這就是他堅持要用苗文重新整理古歌的重要原因之一。〈苗〉文將《跋山涉水》作為Sangt Jingb重述古歌的範例。該文本中

包括了苗語、漢語、繪圖等元素，Sangt Jingb將苗文記音符號與漢文直譯文本上下並置，又將二者與意譯的漢語五言文本進行左右對照。他對古歌中的苗文地名進行了音譯、意譯，或者是音譯與意譯糅合，甚至為一些地名選配了現代國家行政區域建設使用的漢語名字。除此以外，他還為古歌的一些特定內容增加了自創的繪圖注釋，使文字與圖畫相配置，便於人們理解古歌的含義。這些翻譯不僅僅表現了歌師Sangt Jingb對「信、達、雅」原則的堅持，也使得其自身的主體性在從事翻譯的過程中不斷凸現。這種主體性首先是指在為古歌記音和進行苗文譯漢文的時候，Sangt Jingb對歌句上下文的理解及圖文並茂注解的個性創造；其次是指為了充分和詳盡地說明古歌詞句的意思，Sangt Jingb遊歷各方、翻查地圖，根據古歌所敘述的苗人遷徙史在現實世界中尋找歌句中出現的地名和地景，從而通過行走與對照以自身獨特視角探求和增加古歌的現代意義；第三是指Sangt Jingb在重述古歌的過程中，將自己的文化認知與生命經歷結合起來，完成個體對世界、個體道德意義的探索。

成為「翻譯者」是歌師Sangt Jingb能夠被視為「作者」的最重要的角色轉變。Sangt Jingb通過自己的努力超越了普通意義層面的翻譯者，不僅僅把一種語言翻譯為另一種語言，也不限於把一種文字翻譯為另一種文字，他將翻譯視為能夠徹底理解、傳承、交流苗人古歌的重要途徑，更視之為追問古歌意義和探求自身生命意義的不可替代的方式。他不僅演唱、記錄古歌，在翻譯古歌的過程中他還按照自己的理解對古歌進行了重新書寫，使古歌獲得了新的表達形式。這種創造使歌師Sangt Jingb成為個性化的翻譯者、解釋者，同時成為一位實至名歸的古歌作者。因此，作為翻譯者（作者）的歌師是承載苗人社會文化的一個主體。而這種主體性質是人類學家簡美玲在分析研究客體、追問歌師與古歌關係的過程中對歌師Sangt Jingb的理論塑造。

二、簡美玲：民族誌的作者

簡美玲研究歌師與古歌，是〈苗〉文中的求知主體。她在從田野工作到民族誌寫作的過程中獲得了多重角色，分別扮演人類學的實踐者、異文化

的記錄者和翻譯者，在對研究資料的理論解釋和觀點表述中成為民族誌的作者。而這些角色與歌師形成了一種深刻的對照式關聯。

簡美玲根據古歌文本和歌師的生命史透析了歌師不同角色，相應地使自己的多重角色得以顯現。簡美玲從臺灣進入黔东南苗族聚居地區進行博士論文研究課題的田野調查，經歷了由人類學學生轉變為人類學學者的嚴酷成年禮的考驗。博士論文完成之後，她繼續調查苗人古歌和歌師的情況以深入瞭解苗人社會與文化。（同上引:201）這些田野調查經歷促成了簡美玲與歌師Sangt Jingb的相遇和相識，作為民族誌研究的背景它充分顯示了簡美玲在異文化中實踐人類學學科精神的行動者角色。為了通過古歌瞭解苗人社會的口傳歷史，她向歌師Sangt Jingb學習古歌，並將學徒經歷、師徒交流等社會性對話「登記」¹下來轉換為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資料。（同上引:202-204）在參與觀察、親自踐行的過程中，她成為古歌、歌師生命史以及苗人社會歷史等文化符號意義的記錄者。簡美玲整理自己收集的苗人古歌文本及相關文獻資料以更加通俗的形式表述古歌含義，介紹黔东南地區以及整個貴州苗族的整體情況，她直接充當了異文化的翻譯者。（同上引:195-200, 210-234）跳出田野工作的具象，簡美玲在古歌不同形式文本的斷裂處，在歌師Sangt Jingb的生命史中，闡釋了古歌口傳歷史與地方-國家社會變遷的密切聯繫，建構了歌師多重角色深刻的社會文化意義。在此基礎上她反思了人類學家與歌師的互動，推進人類學對理論問題的探討，她像Geertz一樣堅持追尋「烏龜下面的烏龜」（Greetz 1973:28-29），最終成為名符其實的建構文化意義的民族誌作者。（簡美玲 2014:235-246）

由此可見，簡美玲和歌師Sangt Jingb至少擁有極其相似的四重角色，它們之間形成了巧妙的對應關係：就古歌來說，從演唱、記音、編譯到著述，歌師Sangt Jingb一人同時扮演行動者、記錄者、翻譯者的角色，最終成為古歌的作者；就民族誌來說，從田野工作、收集整理分析資料到書寫文本，人類學家簡美玲也是一人同時扮演行動者、記錄者、翻譯者的角色，最終成為民族

¹ Clifford Greetz (1973:19) 認為人類學家研究工作的實質是通過寫作以文本的形式把社會事件登記下來、固定下來，對事件的意義進行文化分析。

誌的作者。另外，簡美玲和Sangt Jingb的相遇還形成了鮮明的張力關係：學者與歌師、學徒與老師、女性與男性的對比分別從三個層面體現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權力不平等。通過觀照這些對應關係和張力關係，簡美玲憑藉高度的學術自覺，以新穎的方式在民族誌研究中探究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反思了求知主體的行為與經驗。

Rabinow在《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1977）中提出與解決的問題是「求知主體的對象化」。他通過對摩洛哥田野工作進行反思將研究主體客體化，寫出民族誌作者的求知過程與經歷。而他對當地文化的專題研究則是通過另寫一部民族誌《象徵支配：摩洛哥的文化形式和歷史變遷》（1975）來表述。於是，他將「對對象的研究」與「對求知主體與對象關係的研究」割裂開來。簡美玲的超越之處在於，巧妙地將本地文化（苗人古歌）、本地人（歌師Sangt Jingb）、「翻譯和解釋」主體三個要素以及這三個要素之間的關係全部結合起來，成為一個整體融於一篇文章之中，即自覺地在一次書寫中實現了主體、客體、主客體關係三者之間的聯結。這樣的民族誌寫作客觀上克服了傳統民族誌和後現代民族誌的關鍵弱點，為人類學走出民族誌表述危機提供了一種可行方式。這種探索其實是一個極為複雜的過程，但是在文章中被簡美玲駕輕就熟地解決了，其寫作手法的高妙之處值得深入分析。

簡美玲將歌師Sangt Jingb及苗人社會文化作為客體進行學術研究的一條明線。〈苗〉文探求古歌的空間文化與知識生產，在各種譯文的縫隙間揭示出歌師的翻譯者角色，突出行動者在文化翻譯過程中的意義建構。此外，文章還有一條暗線使其民族誌寫作實現了對研究者與民族誌書寫者的反思：簡美玲描述自己作為一位女性人類學家與歌師Sangt Jingb的相遇，反觀二者的互動與其間形成的張力關係。在此基礎上，她自覺地對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非單向的權力關係進行了深刻反思。在正式介紹歌師Sangt Jingb之前，簡美玲認為有必要說明一下這篇民族誌本屬意外之作：「我想先將這一趟原不在博士論文研究規劃內的田野歷程寫出來」（簡美玲 2014:201）。田野工作、民族誌書寫和人類學研究中人與人的遭遇所隱含的權力關係在簡美玲心中有著深刻的印記：「一個人類學者與田野報道人之間互為主體的師徒交往……牽

涉到一個人類學者作為學徒、觀察者與解釋者的多重身分、經驗立場……隱微帶出對於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非單向權力關係的反思」（同上引:201）。我們從簡美玲與Sangt Jingb的田野偶然相遇至少可以歸納出三組關係：學者與歌師、學徒與師傅、女性與男性。一、學者與歌師。1997年秋夏之交，博士候選人簡美玲與苗人歌師Sangt Jingb首次相見。簡美玲回憶：「他（歌師）拿著古歌草稿來對我說，苗人的開天闢地。當時，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工作，還未展開，實在無暇他顧。」（同上引）1999年底博士論文研究有了豐厚的積累，簡美玲想借古歌了解苗人的口傳歷史卻苦於沒有合適的報道人，這才想起了兩年前認識的歌師Sangt Jingb。當她獨自前往深山苗寨找Sangt Jingb請教古歌時，歌師對學者的到來有所預見：「他說，早已知道我會再去找他的」（同上引:202）。這是成為教授后的簡美玲對早期田野經歷中自己作為學者與歌師Sangt Jingb互動的反思。年輕的學者只在歌師能夠提供她所需要的信息時才把其當作正式的報道人。但歌師卻一直保持著自尊，他很清楚自己所掌握的本土知識對於學者有著強烈吸引力，當學者明確意識到這一點他就會自動找上門來的。首次相遇時學者表面上的支配權被歌師不卑不亢的態度消解，使得後期合作過程中二者有機會進行平等交流。二、學徒與師傅。為了解古歌，簡美玲在博士論文研究的田野點找不到合適的歌師做報道人。她拒絕了那些提出各種條件才願意開口的歌師，卻想起了有著一面之緣的歌師Sangt Jingb，決定主動到他的寨子虛心學習古歌，而Sangt Jingb早就預料到她的造訪。一些時間他們是在室內「日以繼夜」地由歌師口述古歌詞句、畫圖示意古歌內容。還有一些時候他們步行去別的苗寨尋找更加豐富的古歌資源。短時間內要掌握苗人古歌的精髓存在難度，簡美玲坦誠了這些窘境。

有幾次在學古歌時，我已十分着急，有時會顯得急躁。老人家（歌師）點醒我，但總諒解我……[有一次]在大雪中，從棉花坪一路走了下來。滿山遍野的銀色。一路上，Sangt Jingb還指著起伏的山丘，談古歌的內容。這原本是我最渴望聽到的內容，但在大雪中，我焦慮著如何才能儘快從台盤回到台江縣城，再回到我的田野

點……焦慮與思家之心情（高坡Fangf Bil村寨的家，臺灣的家）交織浮動，使我無法專注于歌師的激情講述，以致於錯過了一個絕好的學習機會。（同上引:203-204）

然而，送簡美玲回縣城時Sangt Jingb還不忘塞上她最喜歡吃的烤粑粑。這一段回憶將歌師教授古歌的耐性、投入和年輕博士學習古歌的誠意、急躁的生動情境展示得淋漓盡致。三、女性與男性。田野中充滿了性別身分的對比，簡美玲對自身的這種敏銳感受進行了柔和的文字處理。「Sangt Jingb家沒有當家的女人（當時他的妻已往生，兒尚未娶媳），所以我去住了另一位*bad dlat*（伯父，他是Sangt Jingb同一房族的哥）家」（同上引:202）。當互動雙方的性別差異被凸現出來，兩位當事人都遵從了相關禁忌（這裡面有著雙方的跨文化理解），又在維護彼此身分地位的前提下保持了工作關係。還有一則故事，雖然與歌師Sangt Jingb沒有直接衝突但還是凸現了簡美玲的女性特徵，提醒讀者注意女性人類學者在男性主導的社會環境中從事田野工作可能面臨的危險。某天師徒二人到旁海（Bangk Hab）苗寨尋訪古歌，Sangt Jingb的二女兒及女婿家在那裏。簡美玲獨自夜宿糧管所，宿舍條件比較艱苦。這一夜不僅被凍醒，還受到驚嚇。

夜半有人來敲門。好像就是Sangt Jingb的女婿。他還不老，小孩也在學前年齡。事後回想，他是來找我遊方。²但我當時，因獨自一個人睡在獨立的房間，夜裏整理筆記，在暗夜中火爐還亮著。我記得因害怕而心跳的很厲害。我也忘了當時如何回話。他在門外晃了一陣子，就離去。我趕緊關燈躲進棉被裡。（同上引:203）

這一段描述顯示了女性人類學者遭遇突發事件時的行為反應和心理活動。對於田野工作中發生的這種潛在的吸引、界限模糊的兩性接觸、女性人類學者

2 根據簡美玲的註釋，黔東南苗族地區有著一些存在於婚姻外的談情說愛習俗。遊方屬於其中一種方式。參見簡美玲 2014:201，註釋7。

應該如何恰當處理，簡美玲沒有給出建議，也沒有做更多學理層面的探討。但是她對性別議題的關注和警醒是非常有益的努力。以上一明一暗兩條脈絡的交織使簡美玲不僅將田野工作材料作為研究客體完成學術生產，也使她通過反思田野工作及民族誌寫作的過程和經驗，實現了研究者的客體化。

至於對主客體關係的討論，簡美玲則是從三個層面來解決的。首先，是簡美玲對於古歌、歌師生命史的書寫。古歌、歌師最容易被看作是純客觀的事物，但是當它們成為客體，甚至是研究客體，則應當是被主體感覺或知覺到的客觀事物。在〈苗〉文中，二者就是作為民族誌作者的簡美玲所感覺或知覺到的客觀事物。顯然，它們在由人類學家寫就的民族誌中絕對不是純客觀的。我們可以看到〈苗〉文中簡美玲不是泛泛地討論所有的苗人古歌，而是就歌師Sangt Jingb重述的部分古歌展開論述，並且這些經過精心挑選的古歌也沒有全文呈現，民族誌作者僅針對特定的片段進行了理論分析。文章中歌師Sangt Jingb生命史的敘述也不是其全部的生命，民族誌作者剪輯了歌師生命中與古歌相關的典型、重要故事以探討歌師對古歌的理解和創造性重述。既然這裏的古歌與歌師都不是純客觀的事物，那麼我們可以將〈苗〉文中的古歌與歌師看作是民族誌作者「眼中的古歌與歌師」，筆者將其稱為〈苗〉文的「感覺主體」。

第二，是簡美玲對於歌師與古歌關係的闡述。歌師與古歌關係是主體立場、觀念中的研究客體。民族誌作者將自己對古歌、歌師的理解同歌師對古歌意義的理解與追求結合起來，那麼歌師與古歌關係就不是古歌、歌師在人類學家思想中的直接投射，而是人類學家的田野工作經驗累積、理論儲備經由「眼中的古歌與歌師」所激發而產生的創造意象。因此，我們在〈苗〉文中看到民族誌作者對歌師與古歌關係的看法與其他古歌收集者、研究者的觀點相異，它們是民族誌作者「觀念中的古歌與歌師」。筆者將其視作〈苗〉文的「觀念主體」。

第三，是簡美玲的自我表述。民族誌作者在作品中的真正顯露不是經由處處標注的「我認為」、「我主張」來表現……而是作者對自己研究目的與立場、知識與理論、研究方法與技巧等內容的直接表達。簡美玲在文章的第

二部分和結論中對自己的目的、立場、價值觀、理論觀點以及個人生活經歷和思想歷程都有所陳述。這些自我表述與上述「眼中的古歌與歌師」、「觀念中的古歌與歌師」融合在一起，顯示了民族誌作者寫作的修辭方法和技巧。因此，我們閱讀到的是經過民族誌作者加工創造並書寫而成的「筆下的古歌與歌師」。筆者將其看作是〈苗〉文的「寫作主體」。

以上三個層次的主體並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指稱「人」的主體，而且是「民族誌的主體」。³ 它們傳遞了人作為求知主體而認識到的兩類知識。第一種知識是本體論知識，是關於「世界是什麼」的追問，例如歌師對「古歌是什麼」的追問。但這裏面隱藏的認識論其實不被一般的民族誌所注意，這就是歌師的知識生成問題。簡美玲將其發掘了出來。在這裏，看似本體論的知識也包含著認識論（知識論）層面的內容。也就是說，簡美玲除了探究歌師眼中的古歌是什麼，還追問了歌師為何對古歌持有一種特殊的看法以及這種看法產生的條件等問題。第二種知識則偏重於認識論，當然也包括對「古歌是什麼」的本體論追問。這種知識是民族誌作者簡美玲對於知識生成問題的理解。她毫不避諱地繼續追問「知識由誰獲得」、「獲得知識的目的是什麼」、「知識獲得的方法是什麼」等問題，試圖回答人類學研究的意義問題。簡美玲區分本體論知識和認識論知識，使得〈苗〉文不僅打破了傳統民族誌求知的既定程式，也拓展了後現代民族誌求知的研究對象。筆者認為對以上三種民族誌主體的塑造以及兩類知識的追問即為民族誌作者對研究的主客體關係的深入探討。

筆者還進一步發現，簡美玲通過「關係轉換」和「生命隱喻」兩種方式完成了主體、客體、主客體關係三者之間的緊密聯結。

一是關係的轉換。簡美玲從歌師「記音」與「譯文」之間的斷裂和接續來思考苗人古歌的地方性與現代性的關係問題。地方性的問題在〈苗〉文中圍繞著「古」歌展開，從時間角度來講就使得地方性被古代性所代替。如此

³ 通過對傳統民族誌的批判和對實驗民族誌的反思，朱炳祥認為所有的民族誌都可以被稱為「主體民族誌」。他將「主體」區分為「第一主體」（當地人）、「第二主體」（民族誌學者）、「第三主體」（讀者和批評家）。（朱炳祥 2011, 2013, 2014）

一來，地方性與現代性的關係就變成古代性與現代性的問題，它由歌師Sangt Jingb收集的古歌與其譯文的對比表現出來。在其翻譯的古歌文本中，這個問題又以苗文和漢文的對照表現出來。然而這只是問題之一，或者說並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實際上最重要的是：作為古歌翻譯者的歌師Sangt Jingb與作為文本解釋者的簡美玲之間的關係是極為清晰的，這對於民族誌作者來說亦是自覺的。根據前文分析可推論出，歌師翻譯古歌導致其翻譯者角色代表著現代性問題；而簡美玲對歌師翻譯文本的進行了解釋之上的解釋，⁴ 這種後現代式的文化解釋，使其解釋者角色呈現出後現代性問題。因此，這組翻譯者與解釋者的關係在時間上可以轉換為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問題，它由歌師重新編寫古歌與簡美玲解讀歌師「翻譯者」角色的對比表現出來。以上古代性、現代性、後現代性關係問題的轉換是一種內在聯繫的創造，得到了關於古歌、歌師、簡美玲三者關係的闡釋，這實際上體現的是簡美玲作為民族誌作者對研究中客體、主體以及主客體關係的觀照與反思。

二是生命的隱喻。它深化了古代性、現代性、後現代性三者關係（也可看作是古歌、歌師、簡美玲三者關係）的意義，是民族誌作者使主體、客體、主客關係實現精緻聯結的點睛之筆。簡美玲在結論部分援引了Walter Benjamin提出的「下一生」比喻（簡美玲 2014:236），暗指古歌、歌師的翻譯，以及簡美玲的解釋，三者都是有生命的民族誌主體。Benjamin將譯本與原著神秘關係解釋為「譯本成為原著下一生的延續」，簡美玲借用其觀點說明古歌的生命是由歷史決定，歌師與譯本的關係源於「歷史的偶遇」，而歌師與古歌的關係也由歷史決定。（同上引:236-237）簡美玲的分析暗示著歌師的翻譯同樣具有生命，而這種生命不同於古歌本身的生命，這是一種極為深刻的見解。那麼，我們將簡美玲的這一洞見進一步推演：古歌可以看作「這一生」，因為它是一種起點；而簡美玲的解釋則是「再下一生」，因為它是對歌師翻譯的理解，是「解釋之解釋」。在〈苗〉文中「這一生」、「下一生」、「再下一生」，三生皆有生命。這種生命是文化創造性所賦予的。簡

⁴ Geertz (1973:15) 認為如果說本地人的解釋是第一等級的，那麼人類學家的解釋就是第二級、第三級的解釋。

美玲自覺地領悟到這一點：她說歌師在進行翻譯性創造之時，「不一定有所本，也不一定為讀者而寫」（同上引:236），不僅是出於某種美學與哲學的原因，更是某種「歷史偶遇」的原因—歌師重述古歌是「一種對於意義與道理的追尋」（同上引:237）。以此類推，我們可以看到：向前推，古歌本身的生命也是由於「意義」與「道理」而被苗人社會集體創造出來；向後推，簡美玲也同樣不一定完全根據於歌師，也不一定為讀者而寫，她同樣是為「意義」、「道理」而寫。這種神奇的、不約而同的、環環相繼的聯結可以看作是人類文化的創造性特徵，它有著突破時空限制的巨大力量。而在這種文化創造之中，當「下一生」誕生之時，「這一生」依然活著；當「再下一生」誕生之時，「下一生」與「這一生」也同樣活著。各個時期創造的意義是並置的，呈現出「多重文化時空層疊整合」（朱炳祥 2009:222）狀態，三者並肩而立，猶如三代同堂。

三、評論家：民族誌的讀者

關於〈苗〉文的民族誌寫作，前文分析出古歌、歌師、人類學家三者追尋意義與道理形成了奇妙呼應關係，這種暗含著的修辭使得文章在閱讀過程中越發耐人尋味。除此以外，筆者認為還有最後一個關於「讀者」的環節需要引起特別的重視。它同樣是一個主體，儘管隱藏於民族誌以外卻是與其共生的另一個主體。這個讀者就是撰寫這篇評論文章的人—當下的「我」。作為主體，「我」通過閱讀與再解釋也進行著文化創造，使〈苗〉文本身擁有了「再再下一生」，同時亦與該民族誌中的其他主體在不同的時空追尋和延續人類「意義」與「道理」的生命。

讀者作為主體是與「閱讀」緊密聯繫的。就〈苗〉文來說，這對關係不僅涉及到民族誌以外，還包含在民族誌的內部：歌師Sangt Jingb閱讀古歌才能重述古歌；簡美玲閱讀歌師和古歌才能從不同譯文形式的縫隙中使譯者現身；評論家閱讀這篇民族誌才能根據其已有表述及未盡之言探索人類學走出困境的可能路徑。這些強烈的關聯是因為閱讀不隨意發生的緣故，它

的實踐遵循著一定的條件和方法。Pierre Bourdieu在〈閱讀、讀者、有文學涵養的人、文學〉（1987）一文中探討了閱讀的具體方式，區分了不同層次的讀者。他認為讀者的唯一對象就是語言，通過將意義據為己有從而更新原有意義，即成為意義的詮釋者而非研讀者，讀者就轉變為「有文學涵養的人」。（布赫迪厄 2012:217-218）正是如此，歌師Sangt Jingb通過將古歌進行「加油添醋或重新解釋」，使苗人古歌中的口述歷史獲得了現時性，成為活的文化。簡美玲對歌師所著古歌文本進行了重新解釋，並對這種解釋進行批判，於是使苗人文化成為學術性的文化。因此，Bourdieu從理論上提出的問題，簡美玲在民族誌的寫作實踐中探索著有效的解決路徑。而對於民族誌的讀者—評論家來說，他們通過對民族誌作者所使用的某些字詞加以挪用或推演，從而建構出〈苗〉文作為民族誌的另一層意義，甚至進行某些理論提升，使其能夠與傳統民族誌、實驗民族誌等相互交流與對話，推進人類學的發展。這就是筆者所強調的對「民族誌」的閱讀。

然而，當一般性的讀者轉變為「有文學涵養的人」，是否意味著他可以對閱讀作品進行隨意詮釋、肆意霸佔呢？這也許涉及到Geertz在「追尋事實」與「意義解釋」之間遭遇的困境，⁵ 此處暫不展開討論。⁶ 筆者提出這個問題試圖說明的是，首先儘管民族誌中不存在純粹的客觀事物，但這些事物畢竟是現實存在或存在過的，因此讀者對這些事物的詮釋是有所本的，具有一定的確定性和封閉性；其次就某個特定事物來說，不同的讀者做出詮釋是各不相同的，因而詮釋具有相對的開放性和多元性，只不過它必須以事物的確定性和封閉性作為解釋基礎。因此，民族誌並非完全虛構，而是在實在基礎上更深層次的、允許多元解釋的學術創作。借用Bourdieu的說法（布赫迪厄 2012:214-215, 221），評論家並非單純訂定字詞意義而是打亂民族誌字詞

⁵ Geertz (1973:28-29;1995:62,167) 在《追尋事實》和《文化的解釋》中以「椅子」、「烏龜」、「大象」三則隱喻說明了事實與意義解釋的區別和聯繫。儘管他的觀點越來越明確但仍然會引起疑問：事實被曲解怎麼辦？民族志寫作將事實的歷史性轉換為現時性，事實是否改變了其本質？如果過於強調「就什麼說點什麼」，「追尋事實」就會出現危機。

⁶ 對於這一問題的專門論述，參見朱炳祥以主體民族志為題對人類學表述觀的討論。（朱炳祥 2014）

的「慣常階序」，建構其另一個層次的「基礎意義」，閱讀著「某位有文學涵養的人」的閱讀。顯然，這裏的「某位有文學涵養的人」一讀者（民族誌作者），也對另一位讀者（本地人）進行閱讀。這就是圍繞讀者與閱讀的議題，「我」、簡美玲、歌師Sangt Jingb之間，即評論家、民族誌作者、本地人之間相互分隔又彼此呼應的共存關係。若繼續對「下一生」的隱喻做延伸理解，評論家也為民族誌開啟了另一段生命，評論家、民族誌作者、本地人三者從不同層面一起延續著人類文化創造的生命。

四、結語

人類學家在一部民族誌作品的寫作中對本地人（本文化的翻譯者）、民族誌作者、民族誌讀者之間關係的恰當把握，對三者使命與局限的自覺和呈現，以及對文本開放性的堅持是走出民族誌表述危機的值得探索的方向。

最後，筆者的一點期望是：〈苗〉文對求知主體的整體性展示尚有提升的空間，可以將民族誌作者自己的思想裝備，自己的立場、觀點、方法更為歷史地、系統地、有機地展現出來，直接清晰地回答「誰在寫作」、「為何寫作」、「為何如此寫作」等問題，拓展民族誌的表述對象，從而真正地克服Rabinow只是將研究過程寫出來的不足。繼續這樣的努力，民族誌就向一種「總體性寫作」又邁出了重要一步：在一部民族誌的寫作中同時完成「對對象的研究」、「對過程的研究」以及「對求知主體的整體性研究」，並使它們有機結合起來，在此基礎上下一步可能的嘗試是對民族誌敘事方式（傳統民族誌的全能視角和實驗民族誌的焦點視角）的變革，從而探索出改變後現代人類學「破而未立」局面的有效路徑。

參考書目

簡美玲 Chien, Mei-ling

- 2014 苗人古歌的記音與翻譯：歌師 Sangt Jingb 的手稿、知識與空間
miaoren guge de jiyin yu fanyi: geshi Sangt Jingb de shougao, zhishi yu
kongjian[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Hmub antique songs: a song
master's manuscript, knowledge, space and landscape]。民俗曲藝minsu
quyi[Theatre and Folklore]183 : 191-252。

朱炳祥 Chu, Ping-hsiang

- 2009 社會人類學shehui wenhua renleixue[Social anthropology]。武漢：武
漢大學出版社wuhan[Wuhan]:wuhan daxue chubanshe。
- 2011 反思與重構：論「主體民族誌」fansi yu chonggou: lun 'zhuti
minzuzhi'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n subjective
ethnography]。民族研究minzu yanjiu[Ethno-national
Studies]3:12-24。
- 2013 再論「主體民族誌」：民族誌範式的轉換及其「自明性基礎」的
探求zailun 'zhuti minzuzhi' : minzuzhi fanshi de zhuanhuan jiqi
'zimingxing jichu' de tanqiu[Further on subjective ethnography:
the conversion of ethnography paradigm and exploration for its
foundation of self-evidence]。民族研究minzu yanjiu[Ethno-national
Studies]3:60-72。
- 2014 三論「主體民族誌」：走出「表述的危機」sanlun 'zhuti
minzuzhi' : zouchu 'biaoshu de weiji' [The third essay on subjective
ethnography: Out of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民族研究minzu
yanjiu[Ethno-national Studies]2:39-50。

Bourdieu, Pierre 皮耶·布赫迪厄

- 2012[1987] 所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會學文集suoshu zhiyan:buhedie
fansi shehuixue wenji[Choses dites], 陳逸淳譯chenyichun
yi[Chen, Yi-Chun, trans.]。臺北：麥田taipei[Taipei]:maitian。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eertz, Clifford

-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Basic Books.
- 1995 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binow, Paul

- 1975 *Symbolic Domination: Cultural form and Historical Change in Morocc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7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6 *Making PCR: A Story of Biotechn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9 *French DNA: Trouble in Purga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3 *Anthropos Today: Reflections on Modern Equi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abinow, Paul, and Anthony Stavrianakis

- 2013 *Demands of the Day: On the Logic of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14 *Designs on the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ical Tes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abinow, Paul, and Gaymon Bennett

- 2012 *Designing Human Practices: An Experiment with Synthetic B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abinow, Paul, and Talia Dan-Cohen

- 2006 *A Machine to Make a Future: Biotech Chronicl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何菊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

mirrorballho@hust.edu.cn

The Subjective Comparison of Translator, Author and Reader:

Out of The Representation Crisis in Ethnography—Review on Chien, Mei-ling’s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Hmub Antique Songs: A Song Master’s Manuscript, Knowledge, Space and Landscape”

Ju 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seems to be a historic predicament that a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y could occur in anthropology at all. If “writing” (representing) means purely “reproducing the Other,” or just having professional introspecti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nd between subjects and objects will be severed in anthropology. These relationships might be effectively re-associated by some new exploratory writings in ethnography, which could not only study objects, reveal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and discover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researchers, but could also offer the space for audience participation in ethnographic narratives. In doing so, they can make a contribution to escaping from the historic predicament in anthropology. Chien, Mei-ling’s article,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Hmub* Antique Songs: A Song Master’s Manuscript, Knowledge, Space and Landscape,” makes such an effort. It not only discusses the song master authoring antique songs and display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anthropologist writes an ethnography, it also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ntique songs, the song master and the anthropologist thoroughly. It also offers readers an open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ethnography. Therefore, the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in addition to analyzing the local culture, Dr. Chien Mei-ling also reflects on the context

and process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doing so, she gives the audience the opportunity to critique the ethnography, by presenting and comparing the roles of cultural translator, ethnographic author and ethnographic reader,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m, within a single article. As a result, it is a creative endeavor to make an organic and integral connection among and between subjects and objects emerge from the representational crisis of ethnography. As a consequence, it finds a way to escape the dilemma of postmodern anthropology.

Keywords: ethnography,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subject
